



「真痞子」來了

● 過 客

去年以來的大陸輿論界是寂寞的，知識份子的各種聲音都被凍結在十年未遇的冰川底下。偏偏在這一片寒風凜冽之中，在各地大街小巷的書攤角落裏，冒出了一批來路不明的「政論」書籍，上至中南海研究的國家發展大思路，下至平頭百姓議論的社會道德淪喪，乃至本來專屬外交部長考慮的對外能否「說不」，統統成為了這些「政論」熱衷炒作的話題。

當別的鳥兒在肅殺秋風之中噤若寒蟬的時候，為甚麼這些蟲兒倒在鳴叫不停？難道他們真的享有某種「獨家爭鳴」的特權？以一般人的常識理解，所謂的「政論」總是要以一定的公共領域作為舞台，有相當的輿論空間作為背景。尤其在中國的國情底下，要想痛痛快快地說話，非得有足夠的耐心不可，等待諸如整風啦、鳴放啦、寬鬆啦……這樣的恩賜機遇，而

且還要有足夠的風險意識，鬧得不好就是一頂「右派」、「自由化份子」或「持不同政見者」的帽子，讓你永世不得翻身。奇怪的是，這兩年上頭也沒有號召大家鳴放，倒是再三懇求各位知識份子兄弟「幫幫忙」，「不要添亂」。偶爾有個把不識抬舉的，敬酒不吃吃罰酒，下場都是有目共睹的。在這等氣候底下激揚文字，指點江山，究意是作者們都吃了豹子膽，義無反顧，鋌而走險，還是有關方面對其格外照顧，網開一路，留個把聲音，以壯門面？

有識者告之，這些「政論」既不是反潮流，也非當局特別授意，而是一種別開生面的投機產業。投機者，古已有之，來來往往，皆為利也。今日「政論」之投機，為的是哪般，有何厚利可圖？這些「政論」投機之道，可粗分兩類：一類為政治投機，一類是商業投機。先談政治投機。最有名的，莫過於《與總書記談心》以及它的姐妹作《關鍵時刻》了。這兩本書的作者群，號稱都是當今大陸知識界的年輕精英，前者以中國社科院「青年社會科學論壇」為班底；後者的隊伍更加壯大，分別來自五湖四海，大江南北，儼然一派「為了一個共同的目標，走到一起來了」的會師氣概。中國政治講究的是陰招，最厲害的人物往往是只做不說。為甚麼他們偏偏要犯兵家之大忌，急於在「關鍵時刻」站到前台「與總書記談心」？《關鍵時刻》的某主要策劃者私底下的一番話泄露了天機：「第二代領導人已經有自己的理論，第三代領導人打甚麼旗？用甚麼理論？我們的總書記心中無數，那個急呀。我們做知識份子的，只有犧牲自己，集思廣益，為總書記分一

點憂罷！」自然，上條陳、獻對策，也是「分憂」的一種。不過，自己種下的仙桃，讓別人摘了怎麼辦？還是依照市場經濟的慣例，搶先註冊商標：這個旗號、這個理論的知識產權——是咱們的！

再說商業投機類「政論」。在海內外名聲大噪的《中國可以說不》是當仁不讓的始作俑者。儘管《說不》比《談心》在架式上要牛氣得多，但作者原先不過是故作姿態，企望在市場上賣幾文小錢而已。當初，這些流浪文人瞄準了似乎聳人聽聞、實際無傷大雅的話題，一連炮製了好幾本暢銷書，其他的都無聲無臭，暢銷不起來。惟有《說不》陰差陽錯，一炮走紅。「說不」者不僅財源滾滾，而且還儼然一夥「義和團」式的反帝英雄。自從《說不》投機成功，東施效顰者如過江之鯽，令人眼花繚亂。先是圍繞着「說不」大做繞口令文章，隨後就由外而內，「研究」起國內的政情。諸如《國是論衡》、《二十一世紀中國的大趨勢》之類層出不窮，煞是鬧猛。鬧猛得連始作俑者也暗暗發急，惟恐市場效應，過期作廢，於是加班加點，生產續集，從對日外交到「第四代人」，挖空心思，無不論及。這類商業性「政論」講究市場賣點，只要政策容許，有轟動效應，書商們就會僱用一批寫手，剪刀加漿糊，以一天等於二十年的大躍進速度製造出來。可以想像，這些「政論」是如何地文理不通，難以卒讀。但只要書名出跳，撩得人心癢，每位讀者一次性上當一回，書商們就大有斬獲，成暴發戶了。

以上兩類「政論」，一個嚮往着紅地氈，另一個希冀着黃金路。實際

上，紅道黃道原是同道，從政與經商，本來就是血脈相連、原理相通。經商若有廟堂效應，從政又收錙銖之利，豈非一箭雙鵰，名利雙收？看透了這一點，我們方可理解，無論是討政界歡喜的，還是投商業之機的，從策劃、包裝到宣傳，走的都是暢銷書路子，國營大書店裏不大見到，個體書攤上泛濫成災。

這樣的「政論」，實在無以命名，只能以「偽政論」稱之。或有厚道者相問：你說它們是投機之作，是否過於苛求，有失公正？不能因為不贊成其觀點，就斥之為「偽」吧。——答曰：作為政論，究竟持甚麼樣的觀點尚在其次，一個理性的、健康的公共領域，本來就應該容納各種多元的聲音，激進的也罷，保守的也罷，自由主義的也罷，只要是言之成理，持之有據，都該有其一席之地。然而，真正的政論，最起碼要有政治的真誠感和責任感。所謂真誠，就是自己的那些觀點（即使是不中聽的，大家聽了都要起鬨、發噓聲的），的確是出自一己之內心信念，並非朝三暮四，隨行就市。而責任感，就是韋伯他老人家所說的責任倫理，對自己的言論所可能產生的社會結果，敢於承擔充分的政治責任。

比照當今活躍在大陸的這些「政論」作者，有哪個真的擁有這樣的道德真誠感和政治責任心？他們僅僅是千變萬化的政治／商業市場的短線投機者（連一個長線投資者都不是）。所有的投機訣竅，大約可以歸結為三句話：一看臉色，二跟行情，三抓機遇。今天中美關係緊張了，我就來個「說不」，明天緩和了，就該「YES」了；上頭需要甚麼、着甚麼急，下面

就來個投其所好，雪中送炭。甚麼談得，甚麼談不得；哪裏是痛處，哪裏可以搔癢癢，全都一清二楚，明明白白。這些拎得清、識時務的明白人，所下的賭注是十分準確的。個中的奧秘無他，只是牢牢守住兩條底線，即王蒙當年評價王朔的警世名言：「既不違背四項原則，又能適應市場經濟。」

值得提一筆的是，這些「偽政論」的作者，並非七老八十的思想僵化之輩，他們大都年輕得很，50、60年代出生，碩士、博士、教授、研究員的頭銜足以嚇唬一般天真爛漫的大眾。不久以前，有些人似乎還是一個堅定的自由主義者、熱愛西方民主的鬥士，甚至為出過一本甚麼書、說過一些怎樣的話，挨了整、受了氣。然而，識時務者為俊傑，大氣候一變，他們像一頭四季要換皮裝的熊科動物一樣，也搖身一變，變為時下頗為時髦的新保守主義者了。至於明天還會變成甚麼，只有老天曉得。為甚麼守不住自己的政治信念？一位以研究國情而名噪一時的京城小腕曾對朋友道出衷曲：「我甚麼年齡？都已經快奔五十了！這年頭年輕人上得猛，我再不拿出一點讓上面賞識的東西，就沒有我的戲了！」至於更年輕一點的，索性是無信仰的一代，理想主義早已是一面褪色的旗幟，最高的人生信條便是簡單實用——甚麼可以用最小的風險博取最大收益的，我就信它的了！商人的精明加政客的滑頭，就是這幫「新生代」的全部政治素質！

生意人畢竟是生意人，他們懂行情，善包裝，知道如今要販運「新保守主義」的膏藥，假使像「老左」們那

樣，板着一張馬列主義的鹹肉面孔，肯定無人問津。要想請讀者入甕，乖乖打開錢包，非得在「新」上面下功夫。如何個「新」法？變個腔調而已。如今不是流行「民間思想」、「民間話語」麼？我就搶先打一面「民間」的旗號好了。翻翻這類「偽政論」，的確不像「老左」們那些「九評」式的大批判文章，到底是年輕的生意人搞出來的貨色，語言煽情，修辭現代（甚至後現代），一派鄉村思想家俱樂部的民間風範。

不得不承認，這些思想贗品，就像市場上的其他假冒偽劣產品一樣，包裝術一點也不假，足以亂真。難怪有這麼多的老外、海外同胞，會信以為真，真的以為民間的聲音出現了，大陸的知識界保守了，老百姓要對西方「說不」了。這些常常被大陸的表象玩得團團轉的「中國通」、流亡思想家們，大概忘記了毛主席他老人家當年「透過現象看本質」的諄諄教導。他們的眼光老是在「民間話語」的表層滑行，不知道用一把手術刀（哪怕是生鏽的）切開文本的表皮，讀讀裏面的意蘊。其實，這哪裏是民間的思想討論，分明是官方意識形態的民間化詮釋！你以為這些「政論」的作者真的敢與總書記面對面促膝「談心」，真的要對美國白宮吼一聲「NO」？哪門子的事！只不過是一個漂亮的姿態，一個老練的造型。他們所能做和所敢做的，只是誠惶誠恐的「交心」，或迎合官方的外交政策而已！

因為有這些「偽政論」充斥着市場，就給一些不明就裏的觀光客一個錯覺，以為時下大陸的政治氣候很活躍、很寬鬆、很多元。現在我們已經知道了，「活躍的」、「寬鬆的」只是一

種聲音，那就是曖昧的「新保守主義」；至於「多元」，不過是民間的「新保守」與廟堂的「新保守」糾纏不清的磨合而已。乍看之下，民間的新保守主義似乎與意識形態相去甚遠，實際上，它對廟堂的意識形態不僅不發生絲毫的解構，而且還時常扮演着幫忙或幫閒的角色。幫了閒也罷，更可惡的是還要以此贏利。當其他的聲音被禁錮的時候，他們獨霸市場，利用讀者關切國是的心理，以假亂真、以次充好，推銷了一大批不堪卒讀的「偽政論」，真可謂發了國難財。

當年地攤頑主王朔嬉笑登場，就有人驚呼「痞子來了」！其實，那不過是一場「狼來了」的虛驚。王朔文學雖說是「痞子文學」，但畢竟還有解構虛妄、拆除廟堂意識形態的一面，況且王朔本人也未必像小說那樣痞，是一個「躲避崇高」的「假痞子」。而今，這些「偽政論」的製造者，倒是一夥貨真價實的真痞子：明明沒有操守，卻要提倡人格；明明不講原則，倒要為國立法；明明缺少崇高，還要宏揚正氣。如此作派之「偽君子」，豈非是最標準的「真痞子」——本來，「偽君子」與「真痞子」就是一張面孔兩張皮：「君子」為表，「痞子」為裏；「君子」為虛，「痞子」為實。真真假假，表表裏裏，虛虛實實，乃是中國「兵不厭詐」之傳統智慧也。

「真痞子」來了——這倒是要格外引起世人警惕的。